

语篇·主体·精神分析

——话语分析的精神分析方法浅论

殷祯岑

(复旦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433)

提 要 在精神分析的理论视野中,语篇可视为主体欲动与话语规约相互作用的产物。通过对语篇及其发生语境的考察,我们可以探索制导语篇意义生成的话语规约体系,实现对话篇意义、话语主体和社会文化语境的全面观照。本文以对官场话语的分析为例尝试构建这一分析路径,力图将精神分析的理论方法引入话语分析,促进语言学意义的研究。

关键词 语篇 主体 话语分析 精神分析方法 解析符号学 主体欲动 话语规约

DOI:10.16027/j.cnki.cn31-2043/h.2015.03.006

一、研究背景

1. 语言学研究的困境与转型

由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是 20 世纪语言学研究的主流。它以对系统、形式、关系的强调而超越历史比较语言学“要素中心”的语言观,实现了语言学研究范式的转型。索绪尔之后,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语言学的每一步发展都在结构主义范式的基础上展开。不仅如此,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还被广泛借入其他学科,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的典范。

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最大优势在于,它从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中抽取稳定、客观的形式结构,通过对成分、关系、分布、系统的把控统摄全局,从而以简驭繁,使语言成为可被明确观察和掌控、不受外界干扰的自足体。正因如此,索绪尔以降,语言学研究的形式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至转换生成语言学达到极致。

但是,语言毕竟不仅仅是抽象的形式结构,除了形式,它更具有表达人类经验世界的本质功能。结构主义以简驭繁的系统性方法虽使语言成为易于把握的客观对象,却牺牲了语言中最重要的部分——意义。结构主义牺牲意义所造成的困境在布龙菲尔德那里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他曾直言不讳:“在语言研究中对‘意义’的说明是一个薄弱环节。”(布龙菲尔德 1986: 167)“处理意义必然会招致麻烦。”(转引自徐志民 1990: 29)而到了转换生成语言学,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它最终导致了盛极一时的转换生成学派的解体。

结构主义研究“意义”软肋的暴露迫使学者们超越固有模型,寻找新的研究途径。于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语言的意义问题。这种关注结合哲学中的修辞学转向,带来了语言学研究观念的更新:语言不再只是根据关系确立系统的形式框架,语言学成为“一门研究人们如何通过使用语言交换意义的学问”(韩礼德 2001)。实际使用的语篇成为语言学研究的新维度,语用学、话语分析、应用语言学等强调语境、语篇、意义、语言使用者的分支学科应运而生。

2. 话语分析

结构主义与意义研究的不相容或许是因为:语言的意义是语境中的话语对语言使用者产生的个性化影响,它只有在具体的语言环境和语言主体都在场的情况下才能被细致考察。而结构主义语言学关注语言的抽象形式及其关系系统,其立论的前提就是要排除个性化的主体因素和环境因素。所幸,自转换生成语言学之后,新兴起的分支学科致力于弥补结构主义方法的缺陷,纷纷将语言形式放入具体的语篇及其所产生的环境之中,使意义的考察成为可能。

在这一方面,话语分析表现得尤为明显。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以 Harris(1952)的论文 Discourse Analysis 为起点的,而它的真正繁荣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陈平(2012)曾将话语分析最重要的特点概括为:将语言形式的研究与其使用语境紧密结合;其典型研究对象是超句组织。

此外,熊涛、毛浩然(2012)将现有的话语分析路径分为:(a)话语结构的研究。它研究语篇的组篇方式和结构框架,将句内语法的研究方法扩展到篇章层面,是话语分析的最初形态。(b)话语功能的研究。它将关注点从形式结构转移到意义功能,研究语境中的话语,如对语篇进行信息结构分析、言语行为分析等。(c)话语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它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通过话语揭示潜藏在其后的社会秩序、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如交际民族志研究、互动社会语言学研究等。(d)批评话语分析。它运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如系统功能语言学)进行语料分析,试图寻找隐藏在常态话语背后的关于社会权力、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的认知规律。

综合观之,话语分析研究的是具体语境中的语篇,话语分析具有明显的外指性:它关心话语的使用者和使用环境,研究的目的是结果也多指向外部而非语言系统本身。即使是在语言学框架内进行的话语研究也是在综合话语内容、话语主体和语境因素的基础上得出的规律性认知,与传统抽象、形式化的语言研究差别很大。就分析方法而言,话语分析除了可以运用语言学方法外,还可以使用其他学科的分析路径,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由此,我们可以将话语分析粗略地概括为:它关注具体语境中使用的语言,通过语言学或非语言学的方法分析这些话语,揭示其后隐藏的语言、社会、文化规律。

作为一种语言学方法,话语分析拒绝形而上的终极旨归,其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的都表现出明显的形而下和多元性特征。这正好弥补结构主义因过于抽象而难以深入考察具体语言现象及其意义的缺憾。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话语分析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现有的分析多集中于使用某些语言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方法,而话语分析理应借鉴更多学科的理论思索,才能揭示人类的经验世界,探索语篇背后的语言、社会、文化规则。本文受克里斯蒂娃 2012 年在复旦大学所做的讲座《陌生的自我》(克里斯蒂娃 2015)的启发,尝试探索精神分析视野下的话语分析新路径,以期将精神分析这一具有“人类思想革命”意义的理论引入语言学,寻找话语分析和语言学发展的新契机。

二、精神分析

1895年,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合作出版了《癡症研究》,标志着精神分析学(psychanalysis)的创立。弗洛伊德在长期的精神病治疗实践中提出了几个基本假设:

(1)人的心理世界除了意识层面外,还有更为广阔的潜意识空间,潜意识为意识所遮蔽,但对人的思想、言行具有巨大影响。

(2)潜意识由与生俱来的性冲动驱使。性冲动是个体思想行为的根本动力所在。

(3)人的心理过程是本能冲动的宣发与外部规约对本能冲动的整合、压抑的互动过程,两者互动关系的失调引发各种精神病症。

(4)人的精神结构可划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部分。在这些原则之上,弗洛伊德以“潜意识”和“性冲动”为核心构建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框架,实现了对心理学理论系统的重构。

弗洛伊德之后,学者们以各自的见解和需要来改造和发展精神分析,使本就博大精深的精神分析理论变得更加派系复杂,难以把握。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号召“重回弗洛伊德”,希望从弗洛伊德的原典中提炼其思想的精义。在《陌生的自我》(2015)中,克里斯蒂娃认为弗洛伊德的最大贡献在于重构了主体理论,他的潜意识假设允准了一个不同于笛卡尔式理性主体的新型主体存在,这个主体不具备理性、同一、结构化的稳定形象,而是本身包含着非理性、混乱和异质性的成分。这些成分使主体成为一个复影:“一面是平和的(理性、同一、稳定的“我”——笔者注),一面是危险的(非理性、碎片化、不稳定的“我”——笔者注)。而这危险的一面……我要把它压制下去,只留下平和的一面继续生活。”被压抑的“我”留存于潜意识之中,随时准备着破坏理性主体的稳定结构,使理性的“我”因不能控制自己而感到不安。因此,我们在外界感到的陌异感并不真的源于外界,而是源于我们因无法掌控自身而产生的不安和焦虑——“我是自我的异乡”。

在崭新的主体理论之上,精神分析开启了全新的研究范式,对整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就语言学来说,弗洛伊德、拉康和克里斯蒂娃都曾思考过要将精神分析引入语言学研究,弗洛伊德在对梦的研究中发现无意识的象征逻辑,并通过对该谐语的考察证明这一逻辑同样存在于更为复杂的能指系统中,拉康提出“无意识像语言一样结构”,并以此阐释能指与所指的不确定关系;而克里斯蒂娃则在符号学研究中全面引入精神分析,发展出以符号意义的动态生成为焦点的解析符号学理论体系。上述尝试以解析符号学思想最为完善、周密,本文对话语分析新路径的探寻即以此为基础展开。

三、解析符号学

克里斯蒂娃吸取精神分析本能冲动与外部规约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和异质主体观,发展出解析符号学理论(semi-analysis)。解析符号学研究符号意义的形成过程,将语言看作主体欲动(此概念在弗洛伊德本能冲动的概念上发展而来,本文第五节第1小节有详细阐述)与社会规约(概念的详细阐述见本文第五节第2小节)相互作用的产物:主体的欲动天然倾向于宣发,外部的结构规约则倾向于压抑和整合欲动,两者的相互作用使彼此形成稳定的结构整体(指意文本),而两者相互作用的不同方式产生符号指意的不同类型。克里斯蒂娃指出:“语言是一个意指过程,语言实践既是一个体系也是一种越界(否定性),是声音生产的冲动性基础

与声音发生于其中的社会空间的共同产品”(2006:326)在这一理念之下,解析符号学以异质性(heterogeneity)精神为线索,展开了对符号指意过程的研究。(殷祯岑 2013)

1.主体的异质性

克里斯蒂娃强调主体理论在语言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她批判传统语言学研究将语言的使用主体预设为纯粹理性的人,而忽视人类思维中的非理性因素,认为这样的语言学只能研究语言的结构、命题和功能性成分,无法涉及语言使用中的个人性因素。而语言是“言语主体在本能冲动驱使下的话语行为”(克里斯蒂娃 2006:312)语言中不仅有一致、结构化的功能性成分,也有因主体本能冲动而异,不能被结构化的个体性因素(如语调、节奏等)。对这些非理性因素的研究有赖于重新定义语言主体,将主体还原为由理性主体和非理性主体共同构成的真正的人。

精神分析的分裂主体观为克里斯蒂娃提供了这样的理论基础。克里斯蒂娃由此提出言说主体的概念:言说主体能分裂成意识主体和潜意识主体。意识主体产生于文化之中,潜意识主体寄身于身体欲望之中。意识主体形成之前,潜意识中的生理和心理冲动把控着主体,而通过语言的习得,外部的社会文化规约得以进入,对潜意识冲动进行压抑和制约,从而诞生意识主体的暂时稳定态。但即使在稳定态中,主体的非理性冲动依然存在,它们潜伏在潜意识中,时刻准备着破坏主体的意识结构。由此,在欲动、规约的相互斗争中,言说主体不再如传统主体一般稳定、统一,它永远处于形成、变化的过程之中。主体是异质的和分裂的,只存在暂时的稳定态,不存在本质的同一性。

2.符号生成过程的异质性

解析符号学研究符号意义从无到有、从混乱到清晰的动态生成过程。克里斯蒂娃将这一过程分为前符号态(semiotic)和符号象征态(symbolic)两个阶段。“前符号态对应身体性的物质现实。符号象征态对应超越论的领域以及历史、社会和意识形态。”时间上,前符号态先于符号象征态形成,是符号象征态的“母体和基础”。前符号态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场中活跃着主体各种各样的异质欲动,这些欲动来自主体的经验世界,它们互不相干,无法按照一定的规则组织起来,始终处于凌乱、发散的状态。此即符号意指过程的第一阶段。(西川直子 2002:79-122)

前符号态中的欲动本能地要求宣发,却没有一个可以将它们整合起来的规约帮助它们顺利实现表达,于是意指实践进入符号象征态阶段。符号象征态即主体运用理性规约对前符号态欲动进行审查和整合的阶段。在此过程中,只有符合规约要求的欲动才能通过审查,实现表达,而不符合要求的欲动则被压抑,或者变异成其它形式表现出来。经过理性规约的扬弃和整合,欲动与规约紧密结合,彼此以意义结构的形式呈现,符号象征态生成。

正如学者们所说,“前符号态表明我们的身体欲动有进行表达的需要,而符号象征态则为表达前符号态提供了必要的结构形式”。“如果没有符号象征态,一切指意不过是些前语言状态的声音而不成其为指意,但是如果没有前符号态内容,一切指意都是空洞,对生活毫无价值,因为前符号态提供了使我们参与指意过程的动机。”(孙秀丽 2010)正是由于对两者的区分,克里斯蒂娃明确将静态的符号结构动态化,将符号与外于符号结构的因素(主体、其他符号系统)连结起来。

3.文本的异质性

文本是解析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在《公式的产生》(1967)中,克里斯蒂娃说:“文本不是一个语言学现象,不是言语汇集中出现的那种平淡无奇的意义结构,而是意义结构的生产本身。”(转引自姚成贺、张辉 2010)从这个思路出发,克里斯蒂娃将文本分为现象文本(pheno-text)和生成文本(geno-text)。“现象文本是结构和语法层面,它使语言交际得以实现,生成文本是语言中的潜在驱力,现象文本是作为构成结构的语言现象,作为完成的生产物而认识的文本,生成文本是作为生产性乃至生产活动而理解的文本,生成文本是现象文本的萌芽状态,这种萌芽状态的作用被写进了现象文本自身之中,生成文本将现象文本‘摧毁、多层化、空间化、动态化,并将现象文本推向非实体的厚度,因此文本变成了拥有复数音域的共鸣体。”(克里斯蒂娃 2012)简单来说,现象文本即我们日常所见的,作为现象而存在的有形文本,是生成文本的结果和产品,生成文本是文本及其意义的生成过程,是作为过程存在的文本。解析符号学将文本看做由生成文本向现象文本转化的过程,两者共同实现了文本层面的异质性特征。

4.互文性

互文性思想(intertextuality)是克里斯蒂娃以成义过程为研究对象的符号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克里斯蒂娃先后多次为互文性下定义,这些定义虽然表述不同,但核心意义从未改变。互文性概念表达了以下两个观点:(1)文本不是封闭的个体,而是处于与其他文本的相互关系中。(2)文本与其他文本间的关系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文本以转换其他文本的方式与其他文本相联系。

在解析符号学的框架内,互文性概念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意指过程:主体在外部世界中遭遇各种文本,这些文本内化为主体欲动,进入符号指意的前符号态空间。当主体产生表达需要而引入结构规约时,前符号态中的诸文本(欲动)得以与规约相遇,相互作用。在规约的审查和整合下,符合要求的文本(欲动)顺利呈现在符号象征态中,而不符合要求者要么被压抑,要么变更自己的形式,以符合要求的方式实现表达。于是,在主体表达需要和外部结构规约的作用下,来自外部世界的诸文本得以在当下文本的空间中拼接、整合,形成清晰、一致的现象文本。但是,现象文本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只是暂时的,其中潜藏着不符合规约要求的异质性因素,这些因素随时准备着冲破结构规约,使表意实践重又回归混乱、多元的前符号态阶段。符号的指意就在这种结构与解构的过程中周而复始,使每一个文本中都充满了异质的其他文本,同时又具有自己完整、一致的结构特征。

综上所述,文本的互文性实际上描述了符号指意从前符号态向符号象征态,由生成文本向现象文本转化的全过程。文本中随处可见其他文本的身影,却不是这些文本的简单拼合,它经过了主体的内化过程和结构规约的审查、整合过程,是主体对诸多他者文本的转换生成。

5.小结

解析符号学将语言符号的成义过程看做主体欲动和结构规约相互作用的结果:主体欲动天然趋向于宣发,却因没有组织规则而显得杂乱无章,无法直接得到呈现,结构规约压抑和整合不合规范的欲动,为合规范的欲动塑形,使之得以合理的宣发。主体欲动对结构规约的僭越和结构规约对主体欲动的制约相互斗争,最终形成文本,完成符号的意指过程。但即使符号的

指意已经完成,符号中的欲动和规约,及其相互斗争的趋势也仍然存在着,这使得符号的指意永远处于动荡的不稳定状态中,此即解析符号学的核心思想。

解析符号学的基本精神——异质性——贯穿于主体、符号存在状态、文本三个层面之中,形成由理性主体和非理性主体构成的主体异质性理论,由前符号态和符号象征态构成的符号存在状态异质性理论和由生成文本与现象文本构成的文本异质性理论。我们将解析符号学的理论框架总结为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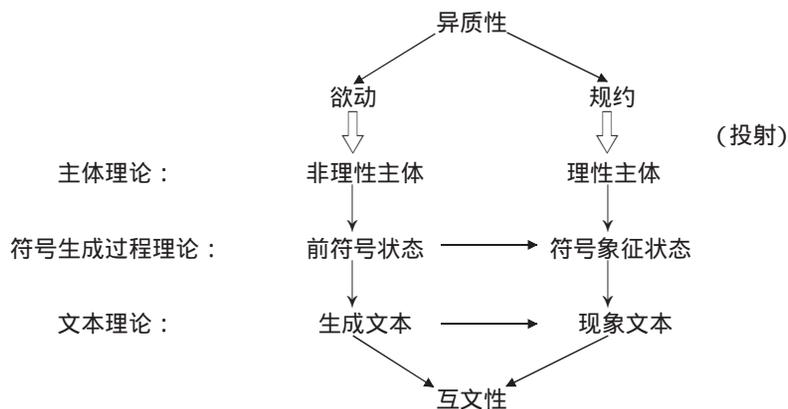


图1 解析符号学的理论框架

如图,符号的异质性由欲动与规约的相互作用构成。异质性中的欲动因素投射到主体层面表现为非理性主体,在符号存在状态层面为前符号态,在文本层面为生成文本;规约因素投射到主体层面为理性主体,在符号生成过程层面为符号象征态,在文本层面为现象文本。而互文性集中体现符号指意的动态过程,它将欲动与规约统和起来,以文本与其他文本互动的形式表现了符号意指过程中的异质性、不稳定性特征。

四、话语分析的新路径

在精神分析与语言学研究相结合的道路上,克里斯蒂娃的解析符号学走得最远。它以精神分析的研究范式重构符号学的理论框架,建立起周密、稳固的多层理论系统,使这一结合具有了操作的可能性,而不再停留于形而上的理论探讨。但即使是克里斯蒂娃,也认为要将精神分析引入语言研究,发展出切实可行的分析路径有很大困难。正如她所说:“语言分析理论没有现代语言学登峰造极的形式或数理理论所支持的那种严谨……语言学家对精神分析在语言中的运作鲜有兴趣,而且我们也很难看到如何把诸如美国结构主义和生成语法的形式化表达和弗洛伊德以降的现代精神分析所表述的语言运作原理调和到一起。”(克里斯蒂娃 1989: 274)然而,话语分析的兴起,使这种结合变得前景乐观。

解析符号学的强大功能在于,它以主体欲动与结构规约的异质互动为主线,能透过僵硬的语言形式,激活其下广阔的历史文化空间和主体精神空间。这一思路与话语分析通过分析语篇,揭示其后隐藏的语言、社会、文化规律的旨归极为契合。在话语分析的视野中,精神分析与语言研究的对立消失,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考察话语的主体欲动、结构规约和语篇样态,找到切实的分析方法。请看下例:

(1)背景:柳秘书长有意为朱怀镜的朋友李明溪办画展,下面是两人的对话。

柳秘书长谦虚道:“明年五月份市里准备搞个招商会……可以考虑给他办个画展嘛。你问他有没有这个兴趣吧。”朱怀镜心想,荆都画坛名家荟萃,李明溪分量怎么样?弄不好就露馅了。但事已至此,退是不能退了。再说他也想帮帮李明溪,就先发制人:“李明溪早同我说过,想搞一次个人画展。但是那得自己筹资,他就搞不起。”(王跃文《国画》)

此例是小说官场话语的典型实例。根据解析符号学,例中朱怀镜和柳秘书长的对话语篇是在两人的主体欲动和官场话语规约的相互作用之下生成的。那么我们如何运用解析符号学分析这段话呢?从朱怀镜的回答及其心理活动可以看出,朱怀镜在答话前产生了三个欲动:(a)担心李明溪水平不够给柳秘书长丢脸,不想帮李明溪。(b)真心帮助李明溪。(c)通过帮助李明溪以顺从柳秘书长,得到他的好感。此即构成朱怀镜反馈话语前符号态中的三个主要欲动。然而,朱怀镜的反馈话语中只呈现出欲动(b)和(c),欲动(a)消失。这是因为意识主体启用了官场话语规约对欲动进行了审查和扬弃。朱怀镜不帮李明溪的欲动由于与柳秘书长的意愿相违而被放弃。如此,我们可以挖掘出官场话语的一条特殊规约:顺从上级的意愿。以这一规约观照上述三个欲动,我们发现,欲动(a)与规约相悖,被规约压抑,不允宣发;欲动(b)和欲动(c)与规约一致,符合要求故能实现宣发。

如此,通过分析具体语篇及其发生语境,我们可以重构话语生产过程中主体欲动与结构规约的相互作用情状,从而挖掘隐藏于话语之中,对话语的生成起制导作用的规约体系,触及外于语言的广阔世界。

五、案例分析

在上节例示的基础上,我们分析了806例话语语篇,探讨运用精神分析方法(解析符号学)进行话语分析的具体路径。

我们的语料全部选自新官场小说中的人物官场话语。新官场小说是目前畅销小说的一类重要题材,它通过描摹官场主体的日常生活样态,建构了一个虚拟的文学话语空间。需要说明的是,“官场”与“民间”、“江湖”等术语一样,是一个虚构的文学、文化概念(祝克懿2013),与现实的政府权力机关并不对等。小说中描写的官场主体及其言行也只存在于虚构的官场文化氛围之中,与现实中国家机构的官员形象不能等同。我们选择这类话语进行研究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我们设计的分析方法还只是一种尝试,适合分析话语发生情境明确给出的语篇类型(如日常会话语篇、辩论语篇等),话语发生情境没有明示的语篇类型(如学术语篇、新闻语篇等)尚无法纳入这一分析模式之中。而符合条件的语篇类型中,小说话语的发生情境给出得最为明显;其次,本文设计的分析思路强调话语主体的欲动与社会文化规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而官场小说中设计的人物官场话语是主体欲动(以取得、维持和使用公共权力为基本意图)最为突出,且对话篇形态影响最为明显的一类。鉴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典型性,我们以它为例探索精神分析与话语分析的结合路径。

1. 欲望、需要与主体欲动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欲望对人类具有本原性意义。拉康认为,欲望是人的本质,它产生于

婴儿在母腹中天然安定的整体感。个体一旦脱离母体,原初的安全感消失,婴儿就感到焦虑和不安。这种焦虑和不安导致婴儿最初的啼哭,并在其记忆中留存。他倾其一生也希望回归原初的状态。可是,脱离母体的个体不可能再回归母体,他只能在新的环境中寻找替代品,以实现这种安全和完满。由此,人类欲望的实质就是主体对安全、完满心理状态的追寻。(转引自崔增宝 2009)

欲望是一种无形的心理状态,而生活在现实环境中的主体实现这种心理状态的具体途径就是心理需要。需要问题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重点,学界先后产生过多种理论。简单而言,可以归结为以下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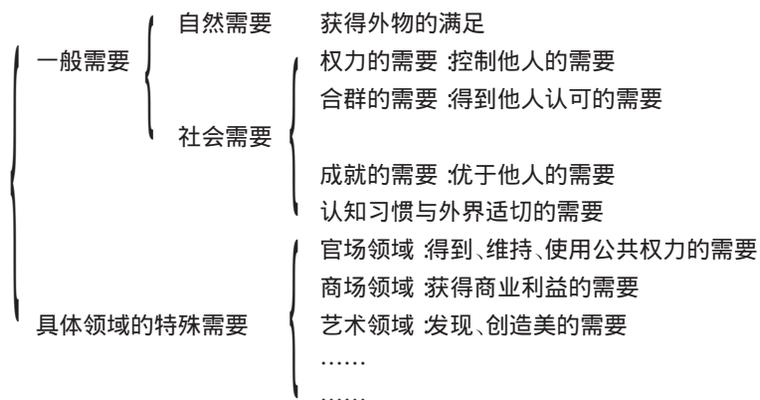


图2 心理需要的类型体系

主体的欲望和需要可以投射于人类的一切言行之中,是人类行为的原动力。而它们在具体话语情境中的投射就是欲动。欲动指向言语活动的起点,为整个话语实践提供动力支持。具体言语活动中的欲动从不是单一、明确的,而是呈多元、异质的发散状态。

2. 话语规约

欲动是主体寻求安全、完满心理状态的欲望及相应的心理需要在具体言语情境中的投射,而规约即是社会规范在具体话语情境中的体现。

“社会规范是人们社会行为的规矩,社会活动的准则,是人类为了社会共同生活的需要,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衍生出来,或由人们共同制定、明确施行的,其本质是社会关系的反应,也是社会关系的具体化。”(陈华文 2001)社会规范由社会关系决定,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帮助个体实现生存、发展需要的重要工具。

社会规范的宏观体系在具体言语情境中的投射就是话语规约。在具体的言语情境中,主体的欲动要寻求宣发,就必须接受各种话语规约的制约。话语规约也是多维的,由文化规约、语言规约、社团规约等内容组成,在不同的话语情境中,发生作用的规约也不相同。

3. 欲动、规约的相互作用模式

按上节示例的方法,我们分析了 806 例小说官场话语的主体欲动及其在语篇中的呈现状态,推理出话语生成过程中与欲动发生互动关系的话语规约,及两者的作用方式。我们发现,

主体欲动和话语规约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一致关系和冲突关系两种。当欲动与规约一致时,两者的相互作用有两种模式:欲动利用规约,帮助自己实现宣发;规约建构欲动,为欲动赋形。当两者处于相互冲突的关系时,它们共可发生三种方式的互动:规约压抑欲动,不允许欲动宣发;欲动通过规约曲折宣发;欲动冲破规约直接宣发。请看下例:

(2)背景:县长内定人选明扬在选举中落选,官员田家永主持召开会议,要求再选一次。

“我紧急请示了龙书记和王市长。他们的意见,一定要保证组织意图不折不扣地实现。刚才的选举显然是存在问题的。我的意见是县长再选一次。这个意见,他们同意了。”李非凡说:“我拥护田书记传达的意见。但个人认为,再选一次是否符合组织法,是否会引起舆论震动,都是需要考虑的。……选举有个程序问题,程序是合法和正常的,我们就要慎之又慎。我们一定要把问题想复杂些,把法律问题想得更清楚些,把应对措施想周全些,这样才能确保不折不扣落实组织意图。”李非凡说得冠冕堂皇,真实意图确实不想再选。他也许还幻想,希望市委突然让他改任县长。(王跃文《苍黄》)

上例中,李非凡因为自己的权力需要,不想再选,但他的欲动不能直说,因为官场话语中有听从上级吩咐,以其决定为行事依据的话语规约。在田家永已明确传达了上级意见的情况下,李非凡无法直接将他的欲动表达出来。于是,他利用选举程序的话语规约,表达他与上级意图相悖的欲动。此例中,李非凡强调组织法并不是真心要维护程序的合法性,他只是利用这一规约表达自己的欲动,此即当规约与欲动一致时,欲动利用规约进行宣发的例子。

(3)背景:官员赵德良希望与巫丹同车,又不好意思开口。

唐小舟感觉赵德良想向雷主任介绍巫丹又显得有点尴尬。唐小舟立即说:“巫丹小姐,你去哪里?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赵德良脸上的神色一松,说:“一起吧,让他们送你一下。”巫丹说:“太挤了,我还是打车走吧。”雷主任说:“要不你们坐车走,我……”赵德良说:“那这样好了,雷主任你把车交给小舟,正好这几天我要用车,你的工作多,你先忙去,有事我让小周给你打电话。”(黄晓阳《二号首长1》)

上例中的话语情境与唐小舟本没有直接关联。出于自己的权力需要,唐小舟无需挽留巫丹。他挽留巫丹是因为官场有顺从上司的欲动,满足上司心理需求的话语规约,而这一规约使唐小舟帮助赵德良邀请巫丹的欲动凝结成型,得以宣发。此例中,主体欲动与话语规约一致,话语规约建构了欲动,导致了语篇的生成。

(4)背景:官员刘星明突然要求开常委会,但要求李济运保密议题。

李济运回到自己办公室,打了明阳的电话。明阳果然有牢骚,说:“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不可以跟我先通通气?”李济运只能说几句熄火的话。他猜想议题必定同刘大亮的事有关,只是不能说出来。(王跃文《苍黄》)

上例中,面对明阳的询问,李济运本能地产生据实回答(会议与刘大亮有关)的欲动,以实现其社会需要。然而他不能据实回答,因为官场话语有听从吩咐的话语规约,具有官场特殊需要的李济运必须遵守这一规约,只好压抑欲动,不说议题。这里,积极回应明阳的心理欲动与听从吩咐的话语规约相互冲突,欲动被规约压抑而不能宣发。

(5)背景:秘书方明远、官员朱怀镜与圆真和尚闲聊。

(朱怀镜)说:“佛教总要入俗才有生命力。我觉得像基督教之所以影响这么大,就在于它覆盖了全部世俗生活。可佛教呢?佛法是佛法,世俗是世俗。”圆真说:“您说的

有些道理。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现在佛教是受世俗影响太大了。就说我吧,应该清静静在这里修行,政府却偏给我个正处级待遇。说待遇呢,给个正处又有些不顺,因为我还是市工商联副主席。我们佛教为什么要划归工商联我至今都不明白。就算划归工商联,那就不应该只是个正处级,而应是副厅长级。当然,我不是说硬要明确我个副厅长级,说说而已。要说别的地方,像我这种情况,早进政协常委了。”方明远说:“这个问题我可以汇报一下。”圆真忙摆手,说:“谢谢您,不是这意思。”(王跃文《国画》)

上例中,圆真和尚表达了自己希望明确副厅长级待遇,还希望进政协常委的欲动,但这一欲动他不是直接表达的,而是在闲聊中说出,并且一再强调“说说而已”、“不是这意思”。其原因在于,官场话语有安心工作不钻营的规约,官场中人不能随便提出升官的要求。圆真的欲动与这一规约相违悖,但他的欲动又比较强烈,不能轻易压抑,于是采取曲折宣发的方式,以否定性标记改变欲动的形式实现表达。

(6)背景:官员赵永胜与秦飞跃不睦,觉得侯卫东是秦的人,故借题发挥地批评他。

赵永胜铁青着脸,扭头看着侯卫东,毫不留情地斥责道:“侯卫东,年轻人要老老实实工作。你知道我到沙洲去做什么,却阳奉阴违,成天想着钻营,见缝就钻的人最终没有好下场。”……侯卫东到底是年轻人,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抬起头,一字一句地道:“我是什么样的人,群众自有公论。你作为党的书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滥用职权,很威风吗?”(小桥老树《侯卫东官场笔记 1》)

此例中,侯卫东受到赵永胜不公正的批评,本能地产生驳斥的欲动以维护自己的尊严。但是,官场话语有上司具有绝对权威的规约。为了遵守话语规约,侯卫东本该强压住自己的欲动,可他“毕竟是年轻人”,对赵永胜的驳斥欲动异常地强烈,以至于官场话语规约根本无法压制欲动,欲动冲破规约,直接宣发出来。

综上,在对官场话语进行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总结了主体欲动与话语规约相互作用的五种基本模式,将其整理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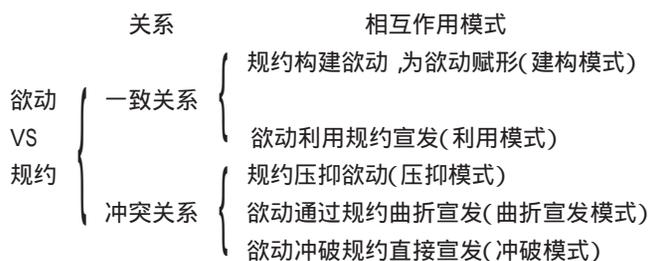


图 3 主体欲动与话语规约的相互作用模式

4. 官场话语规约体系

对全部 806 例小说官场话语语篇进行如上所示的精神分析之后,我们得到制导官场话语欲动表达的特殊规约共 22 条。然而,官场话语主体对这 22 条话语规约并非一视同仁,而是有所偏向的。在此,我们以这些规约在话语生成过程中的分布为依据,复建官场话语的规约体系。

我们认为,当规约出现在压抑、建构模式中时,要比出现在曲折宣发、冲破、利用模式时更强势。这是因为,当压抑、建构模式发挥作用时,规约以强硬、不容改变的姿态出现,欲动则配合规约,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在曲折宣发和冲破模式中,规约或多或少地受到折损,与规约相

冲突的欲动却得以宣发出来,因此这两种模式中的规约强度较弱。利用模式中,规约虽没受到折损,但也没有起到限制欲动的作用,而是被欲动利用,因此强度也不大。

由此,我们将压抑、建构模式中的规约称为强势规约,将曲折宣发、利用、冲破模式中的规约称为弱势规约。同一话语规约在不同文本中可能与欲动发生不同模式的互动。但总体说来,在话语实践中运用得越多,充当强势规约次数越多,规约的强度就越大,相反就越小。有基于此,我们对语料进行欲动/规约相互作用模式的考察,得出表1。(规约强度的统计方法:以规约出现在压抑、建构模式中的次数减去其出现在曲折宣发、利用、冲破模式中的次数,得出话语规约的强度值。)

规约	强势(+)			弱势(-)				结论	
	压抑	建构	总数	曲折宣发	利用	冲破	总数	总数	强度
对领导表示敬重	8	26	34	7		1	8	42	+26
顺从上级欲动,满足其心理需要	19	35	54	8	1		9	63	+45
听从吩咐	23	20	43	2	10		12	55	+21
维护权威	20	17	37	4	9	1	14	51	+23
归功规约		15	15				0	15	+15
与上级密切联系		24	24				0	24	+24
保密规约	12	4	16	5		2	7	23	+9
站在上级立场思考问题		9	9				0	9	+9
不随意发表意见,明哲保身	12	3	15				0	15	+15
礼貌规约	5	55	60	26	1	1	27	87	+32
多交朋友少得罪人	23	5	28	10			10	38	+18
论资排辈,顺序规约		21	21				0	21	+21
以原则、规章、既定政策为处事依据	2	1	3	5	28		33	36	-30
各负其责不逾越	0		0	2	11		13	13	-13
不以权谋私	2	4	6	38	2		40	46	-34
不拉帮结派			0	14			0	14	-14
不行贿受贿	1	0	1	10	5		15	23	-14
其他规章制度	2		2	10	2	14	26	28	-24
维护组织利益、威严,相信、依赖组织	3	3	6		9		9	15	-3
配合其他部门工作			0	5	2		7	7	-7
安心工作不钻营			0	28	2		30	30	-30
树立正面形象	3	38	41				0	41	+41

表1:官场话语规约强度表

官场话语规约强度表反映了话语主体在话语生成的过程中对规约进行选择的倾向性。规约强度越大,话语主体在话语实践中就越倾向于优先选择这一规约来建构话语,规约强度越小,主体就越倾向于忽视这一规约,使欲动不受其管制。由此,通过概括欲动和规约的相互作用模式,考察话语规约在不同模式中的分布情况,我们得以廓清话语规约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到一个完整有序(话语规约以强度系数由大到小进行排列)的官场话语规约体系:

- 1)顺从上级欲动 ,满足其心理需要。
- 2)树立正面形象。
- 3)礼貌规约。
- 4)对领导表示敬重。
- 5)与上级密切联系。
- 6)维护权威。
- 7)顺序规约。
- 8)听从吩咐。
- 9)多交朋友 ,少得罪人。
- 10)不随便发表意见 ,明哲保身。
- 11)归功规约。
- 12)站在上级立场思考问题。
- 13)保密规约。
- 14)维护组织利益 ,威严 ,相信、依赖组织。
- 15)配合其他部门工作。
- 16)各负其责不逾矩。
- 17)不拉帮结派。
- 18)不行贿受贿。
- 19)其他规章制度(无神论、维护新闻独立、男女关系等)。
- 20)以原则、规章、既定政策为处事依据。
- 21)安心工作 ,不钻营。
- 22)不可以权谋私。

如上 ,我们通过分析小说官场话语及其发生环境 ,发掘出主体的话语欲动 ,并通过欲动在话语文本中的呈现状况 ,归结出 22 条官场话语规约。在此基础上 ,我们以这 22 条规约在话语中的具体分布情况为依据 ,重建了小说官场话语规约的有序体系 ,勾勒出官场社会文化图景。

本维尼斯特认为 ,人在文化中 ,“没有一种语言可以与一种文化功能相脱离……文化赋予语言意义”(2008 :40-61)。因此只有在文化的主导下 ,语言的意义才能得到真正全面的研究。我们以小说官场话语为例构拟的这一话语分析路径 ,就是希望通过引入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 ,使语言的意义得以面向社会文化(及主体精神)的广阔世界敞开 ,从而跳出封闭的形式框架 ,得到切实的全面考察。

六、余 论

通过语篇的发生情境把握主体欲动 ,在欲动与文本的对照分析中推理话语规约及欲动、规约的相互作用方式。如此 ,我们复建了语篇意义从前符号态到符号象征态的生成过程 ,实现了对语言意义、主体精神和社会文化语境的整体观照。通过对小说官场话语作如上分析 ,我们确信 ,精神分析方法与话语分析的研究理念相得益彰。在解析符号学的连结下 ,我们得以将精神分析纳入语言学的研究视野 ,以期实现对语言意义的动态考察。

本文设计的研究路径要求待分析的语篇提供充足的发生情境 ,因为只有语境信息丰富的条件下 ,我们才可能把握语篇生成过程中的欲动和规约。否则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话语主体

经过了怎样的千回百转思路崎岖才创造出眼前这个语篇。

虽然本文的研究还只是一种初探,但精神分析的理论博大精深,只要我们继续关注这一论题,一定可以开发出更多、更为妥善的研究路径。在意义研究逐渐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引入精神分析这源活水,我们或许可以发现更新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新思路,找到语言学突破性发展的新契机。

参考文献

- [法]本维尼斯特 2008 《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美]布龙菲尔德 1986 《语言论》,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商务印书馆。
- [法]本维尼斯特 2014 语言的结构与社会的结构,朱江月译,《当代修辞学》第4期。
- 陈华文 2001 《文化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 陈平 2012 话语分析与语义研究,《当代修辞学》第2期。
- 崔增宝 2009 从欲望的压抑到欲望的表达——德勒兹后现代主义欲望观的转向,《求是学刊》第4期。
- [法]弗洛伊德 2003 《弗洛伊德心理哲学》,杨韶刚等译,九州出版社。
- [法]弗洛伊德 2012 《精神分析引论》,张堂会译,北京出版社。
- [澳]韩礼德 2001 《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孙秀丽 2010 解析符号学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熊涛、毛浩然 2012 话语分析的三个维度和一个转向,《外国语言文学》第2期。
- 徐志民 1990 《欧美语言学简史》,学林出版社。
- 殷祯岑 2013 新官场小说官场话语的解析符号学分析,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2006 从同一性到他者,热奈特《西方文学理论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2012 词语、对话和小说,祝克懿、宋姝锦译,黄蓓校,《当代修辞学》第4期。
- [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2013 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和突破,黄蓓译,《当代修辞学》第5期。
- [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2014 互文性理论与文本运用,黄蓓译,《当代修辞学》第5期。
- [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2015 陌生的自我,黄蓓译,《当代修辞学》第3期。
- 祝克懿 2010 互文:语篇研究的新论域,《当代修辞学》第5期。
- 祝克懿 2013a 互文性理论的多声构成,《武士》、巴赫金与本维尼斯特、弗洛伊德,《当代修辞学》第5期。
- 祝克懿 2013b 当代官场话语与生态文明建设,《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6期。
- 祝克懿、殷祯岑 2014 生态语言学视野下的官场话语分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
- Kristeva, Julia 1984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risteva, Julia 1989 *Language: The Unknown..* Brighton: Harvester.
- Kristeva, Julia 1980 *Desire in Language*. New York: C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risteva, Julia 1996 *Julia Kristeva Interview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